

大局

克隆沿海 西部难有神采



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阳光愈是强烈的地方,阴影也就愈是浓重。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来讲,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长期性的棘手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迄今,一个现代中国已然屹立在人们面前:大连-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厦门-深圳-一线,即环渤海湾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俨然现代中国最伟岸的身形。而与此同时,在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三州”地区,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却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光辉形象的不甚亮丽甚至多少有些黯淡的投影。

平心而论,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数千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他们的聚居地区似乎总是和贫困、衰败、落后联系在一起,而新中国最伟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不遗余力地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制订了那么多好的政策,从落实到务虚各路专家学者提交了那么多好的建言,从造福一方到富民升位各部门各级干部施行了那么多好的方案,从苦干到巧干各族群众下了那么多功夫尽了那么大的努力……实际效果却始终差强人意,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贫困落后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并成为困扰中国整体的、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涉及诸多方面的互动、协调、均衡和持续性。举凡民族地区的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自我发展能力;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机制,特别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建设、完善,对特困群体和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推进“兴边富民”,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科技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安定团结,长治久安,各民族间的相互学习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尝试制度创新、深化体制改革,配套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才资源的开发……都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由此也可以断言,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看,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是一项艰苦、细致和长期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把方法和观点、理论和战略、制度和体制、整体与局部、政策和战术、法律和管理、思想和技术……方面方面“统筹”起来,追寻简洁高效可行的战略思路和对策措施。

比如“机遇”和“挑战”的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辨识其历史机遇?或者说,这一机遇的主体何在?这一主体如何看待这一机遇?这一机遇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机遇的“历史”性如何?谁发出挑战?谁遭遇挑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如何辨识这一严峻挑战?或者说,这一挑战的客体何在?这一客体如何看待这一挑战?这一挑战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一挑战的“严峻”性如何?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怎样?从什么基点出发去协调国家、地区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政策、措施、办法等方面的一致?由谁并如何去协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中外源性要素与内源性要素的关系?

在这里,民族地区的禀赋(自然区位功能)、少数民族的观念(伦理价值选择)和相关制度安排(行政经济体系)及其相互间的作用机理问题,都是决不能忽视的。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主选择与外部和上级支持的“协调”或“矛盾”的问题,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与国家宏观战略的利益均衡问题,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与全社会的安定“和谐”的关系问题,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更深刻也更简明的问题还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中国整体国力已挤进世界第四,为什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还如此困难?这种困难还会持续多久?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人们该如何从国家管理的宏观战略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并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管理对策?

归根究底,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抑或规律,我们真的已认识了并把握了吗?

前几年经常在一些地方看到“牵出来,引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的标语口号,而这两年针对同一个问题的提法却转变成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解除计划生育后顾之忧。”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实际?农牧民朴实的话语,常常道出了最简单最直接的真理。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匮乏,乃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迄今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发展软肋,切实做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饮水(包括上下水)方面的“雪中送炭”(其实这本身就是政府的职责),可能比招商引资、建厂办厂、挖矿卖地等更具整体价值和长远价值。

杂俎儿

私权禁地 公权请留步



张晓晖 中银国际证券金融分析师 现居天津

某市警方将从事不良职业的女性与嫖客公审,实际上的效果是示众,引起舆论哗然。据说犯罪嫌疑人未经审判定罪之前不应示众,执法者自身就有违法之嫌。

有些事儿往深里想想,很有意思。如果一定要示众的话,妓与嫖的罪过是不是最严重的?与贪污受贿、杀人越货、贩卖人口、贩毒、贩军火、印假钞、和黑帮上的黑社会相比,无论是社会危害还是犯罪的严重性,是一选示众状元,便赫然当选?

说句玩笑话,妓也是犯罪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妓在违法的同时,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如老舍的《月牙儿》、托尔斯泰的《复活》,写得都很清楚。妓被蔑称为“鸡”,而奚落书生就是“手无缚鸡之力”。妓之所以是弱势群体,一方面是由于背景、体能、性别的自身弱势,另一方面则是

因处于道德上的洼地。比如,杀人越货者上刑场,还能够喊一嗓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然后看客们轰然一声“好”!妓能喊什么呢?

再往深里说,这次的示众者又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抓捕的地方,不在市中心,远离CBD,相关的嫖客大约也没什么背景,说白了,赛金花、小凤仙、《日出》里的陈白露,都不会被公审的,被公审的只能是《骆驼祥子》里的小福子、《日出》里的翠喜,公审的行为即使以法治的名义,其公正性仍然掺了水。

偏偏对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当地的专政力量显示出神兵天降、雷霆万钧的魄力与威力,撇开是否违法不谈,妓与嫖的犯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涉及个人的隐私,把这种隐私暴露在太阳底下,这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就社会而言,面对公权,私权本身有效于弱势,如果社会不对公权进行有效的约束,就可能形成公权对私权的暴力践踏,而私权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则谈不上公民的福祉与安宁。事实上,公权的无限延伸曾经给私权带来严重的侵害,封建社会对淫妇的骑木驴,脱去衣裳鞭打,装入竹笼沉塘,既是惩罚又是示众,而看客也满足了心理上的快感;闯入家庭,对家庭里随便玩玩儿的小麻将,也要

以赌博的罪名处罚;闯入住家,管人家两口看黄色录像。这算什么?法律如果过度闯入道德的范畴,那就是暴力。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看一个人的人品,要看他如何对待比他本人弱小的人”。同样,看一个社会的道德高度和文明素质,要看如何对待弱势群体。记得解放初期,北京关闭全国的妓院,对妓女进行教育、治疗、安置就业,甚至帮助她们组建家庭,让社会的底层人感受到什么是新社会,就体现了新社会的道德与文明形象。

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的是,妓也是人,即使违法也有个人的尊严与权利。说透彻些,如果说高级场所的交际花是为了爱慕虚荣而赚钱,那么坐落在农户区的只能是为了养家糊口。法律该管不假,但要有个适当的管法,给人家留个脸面,留点尊严,留条活路。

公审的初衷决不会是为了着臊谁,恐怕是为了杀一儆百,杀鸡吓猴,顺便搞一下形象工程,岂不知如此一来反而损害了执法者的形象。同样,城市综合执法以砸摊子毁东西来“管理”小商小贩的无限经营,说起来比(卖炭翁)里的“黄衣使者白衫儿”都不如,人家只是强买强卖,还夹道“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呢。

公权要能够遵守法律,体现社会公正,尤其经得起天理人情的推敲。私权被滥用的公权所侵犯,也说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法治社会的必要和紧迫。

彼岸

梅尔·吉布森凭何东山再起

梅尔·吉布森是好莱坞的巨星,2004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极有争议的电影《基督的激情》,当时遭到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等的批评,更有美国犹太人组织强烈谴责和抵制该片,称是反犹太人的作品。尽管媒体的批评和一些组织的抵制,《基督的激情》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市场狂收5亿美元,获得极大成功。

几个月前,吉布森半夜喝醉了酒,开车乱闯,被警察抓住后,破口大骂犹太人,称世界上的战乱都是因犹太人而生。尽管吉布森在事件

发生后迅速道歉,但他的狂言仍然遭到美国全国上下的炮轰。一些人更说,吉布森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仇视犹太民族的人,因为酒后吐真言。许多业界专家预测,吉布森的电影事业将就此告终。在美国,敌视犹太民族是政客和名人最大的罪过之一,对于吉布森来讲,更大的麻烦是好莱坞的许多制片公司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除此以外,吉布森有一部关于马雅文明电影要在年内上演,因此有人预测许多美国观众会因为吉布森的狂言抵制他的电影。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 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上周,吉布森关于马雅文明电影《Apocalypto》在美国2400个电影院上演,出人意外地夺得票房冠军。Apocalypto全剧都用马雅语对话,观众只能看字幕去理解对话,由此可见,吉布森电影艺术水平已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更难以想象的是,人们似乎完



蒋玉磊 制图

人在基金

基金规模暴增:非常态还是趋势?



刘传葵 宝盈基金首席经济师 博士,高级经济师

面对过去基金发行规模“井喷”,笔者曾经大力呼吁谨防“虚假繁荣”,那些以市场外方式吸引客户从而造成泡沫性质的基金规模的伤害性,相信已经在过去的大规模赎回风潮中演绎出来。今天,面对今年新募集的基金规模迄今已超过过去5年基金首发规模的八成,国内基金规模已达逾6000千亿元之巨的壮观场景,也许短期内我们还很难定论这是否是一个新的趋势——是大规模基金理财对升级的开始还是一场全民性的阶段性的对基金的狂热追逐?这种爆棚的基金规模对中国基金业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新的趋势的确立还是短暂的非常态的状况?

此时,至少有以下四点特别值得我们分析、思考和应对:

一是投资者过分乐观的预期,前期巨大的基金收益率所产生的巨大示范效应,激发了大多数人对购买基金获得明年收益美好的甚至幻想般的憧憬,一旦无法如愿,他们必然会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和失望,如果此后形成大规模赎回潮,则大起大落的基金规模未必是基金行业所愿意面对的。

二是如同物价传导时滞、货币政策传导时滞一样,基金投资收益信息的传导尤其对一般不接触基金的新投资者来说也存在一个时间的滞后性。比如2004年3、4月间,由于

2003年股票基金的财富效应,加上当时市场走强,第一次出现了两只百亿基金。而今年春节以来股票市场的上涨引致普通投资者对市场的追逐也终于在5月后再现2004年百亿基金神话。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大规模单只基金曾经在很短的时间里挣扎在单位面值以下,从而对那些滞后的盲目的基金追捧者造成了阶段性的失望。

三是基金的最适度规模。开放式基金的规模效应,这在Ferris和Chance(1987),McLend和Malhotra(1994)以及Malhotra和McLeod(1997)等人的研究中均有所涉及。从经济学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基金当然存在一个“最适度”的资产规模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每单位资产的收益率会达到峰值,而超过或低于最适度规模的区域,每单位资产的收益率都会下降。如何使单个基金规模在投资者的利益和基金管理人利益之间获得一个很好的均衡也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课题。

面对现在沸腾的基金发行,首先让笔者再一次深深认识到,虽然经过8年的发展,基金行业和产品已经获得了社会和市场的广泛认知,但是基金投资常识的普及还任重道远,如果说过去向大众推广更多是为了让大家知道知晓基金这个金融产品的话,那么今天要走向深入的应该是让更多大众更深入地了解基金本身的一些特质。

其次,需要多方采取措施应对基金购买过热。当然,购买基金是投资者的权利,但是,是否任由投资者购买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任何基金产品在设计的时候都是做了客户细分的,那么,可以更明确揭示出该产品的客户对象特征,力争

把该产品卖给最适合的投资者。比如,任何产品都是与风险收益匹配的,而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和人生财富阶段肯定也不同,那么如果在一只产品里出现经济、收入等反差极大的投资者客户至少是这个产品的客户群体没有得到充分的细分。应该说,火爆的发行其实给基金行业提供了一次极好的细分市场的工作,而过往这方面的工作显然相对粗糙。

此外,还可以研究和应用一些制度上的创新,有些公司也采取了诸如缩短发行时间、封顶基金规模等做法。也许等我国基金市场发展发展到规模更大更成熟的一天,基金的“软关闭”和“硬关闭”等制度的借鉴甚至引进并非不可能,这在美国基金市场并不鲜见。

开放式基金的关闭是一种限制基金资产过度膨胀,以维持基金资产收益水平、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基金运作制度。关闭分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软关闭(softclose),基金从关闭日起不再接受新投资者的资金,而原有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还可以继续申购基金。第二种是硬关闭(hardclose),基金发行完毕后不再向任何人出售份额,甚至于原来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也不能再申购。

基金发展要和资本市场发展规模相匹配,我们需要关注市场上符合基金投资标准的上市公司的容量,基金发展需要动态地去顺应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格局,而通过基金的关闭可以使基金经理把资产规模限定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可以有效避免上述的流动性风险,冲击成本与交易风险,规避基金投资风格的蜕化,防止不同类型基金之间的同化。

德鲁克在中国

决策之始 见解为先



黄建东 北京光华管理研修中心 培训总监

中国汽车有史以来最热门的2000年年底,首款经济型轿车“夏利2000”登场。广告上有一句醒目“标语”:“夏利2000——小型车中的高档车”。如果把它与几乎同时推出的“赛欧”作一个简单比较,此话倒并非在吹牛:

“夏利2000”的原型车是日本丰田公司生产的PLATZ。那是丰田当时最新的车型,并于2000年曾被评为欧洲和日本国内最畅销车型。“赛欧”的原型是欧宝可赛,这是欧洲1995年前的车型。显然,“夏利2000”在整体性能上似乎比“赛欧”更占优势。

但是“夏利2000”只风光了一阵,就卖不动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差不多有近20年,夏利的主要市场是出租车,有人说,是夏利让中国普通老百姓尝到了坐轿车的滋味,这的确是“功不可没”。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夏利的出租车形象太强了,以致于人们见到夏利就习惯性地招手。

“小型车中的高档车”也好,“夏利2000”的整体性能比“赛欧”更占优势也罢,都只是生产厂家和业内人士的评价而已。市场上的消费者是如何认识夏利轿车,那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夏利2000”上市前后,《中国经济报》、《南方都市报》和几家汽车网站做了一次调查,77.6%的受访者认为夏利是低档轿车,21.4%的消费者认为是中档车,认为夏利为高档车的只有1%。

几乎是同时推出的“夏利2000”和“赛欧”,为什么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如此不同呢?为什么面对相同的“事实”,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夏利车却有着如此天壤之别的“形象”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确定什么才是事实,必须先确定相关的标准,尤其是有关的衡量标准。”而生产者和消费者在这个标准上并不一致。简单说来,就是生产者认为“好”的东西,消费者认为“不太好”,甚至“不好”。“夏利2000”就是如此。

管理者在做决策的时候,并不是首先收集“事实”。

德鲁克说:“卓有成效的决策者都知道,决策的过程往往不是从收集事实开始的,而是先从其本人的见解(opinions)开始的。所谓见解,乃是尚待证实的假设;见解不能获得证实,就毫无价值可言。但要确定什么才是事实,必须先确定相关的标准,尤其是有关的衡量标准。决策有效与否,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常引起争论的地方。”“先要收集事实是很难做到的,以为没有相关的标准,就不可能找到什么事实。事件本身并非事实。”

其实,管理者都知道,所谓的决策,是把企业现有的资源投入到不确定的未来中去。决策并不是为将来做决策,而是对将来产生的结果而在现在做的决策。将来的结果只存在于决策者的“假设”中间。而且将来的“事实”还没有发生。如果决策者根据现在的“事实”去做现在的决策,那么与“事实”发生偏差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德鲁克在告诫管理者做决策的时候说:“人总是从自己的见解开始,所以要求人家从收集事实开始,是不符合实际的。其结果是,他所收集的事实,必是以他自己已有的结论为根据;他既然有了结论,必能收集到许多事实。干过统计工作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往往最不相信统计数字。统计工作人员也许知道提供数字者的立场,也许不知道提供数字者的立场,但是他知道数字的可疑。”“因此唯一严谨的方法,唯一可以印证某一见解是否符合实际的方法,应该以明确承认‘见解为事实’作为基础——这是必要的做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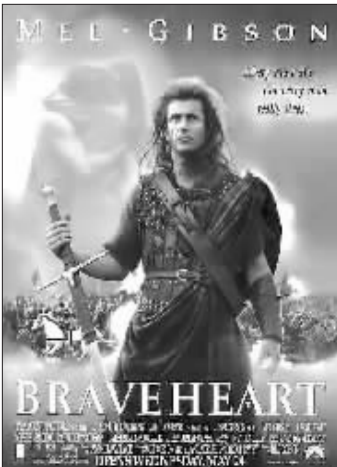
希冀得到别人宽恕。当然,吉布森并非是一个被宽恕的特例,还有一些比吉布森影响更大的人物也都得到更大的宽恕。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是另一个被美国大众宽恕的例子。克林顿在白宫犯下性丑闻,起初还在美国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否认,结果被莱温斯基以确凿的证据揭露,克林顿最终当众认错,并请求原谅,还到教堂对上帝忏悔。出于政治目的,共和党一些组织机构对克林顿穷追猛打,大多美国人不仅宽恕了克林顿,还反感共和党的行为。因此,克林顿离开白宫时,美国有60%的人肯定了他的工作,虽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许多美国人宽恕了克林顿的错误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要

不是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两届,克林顿也许还有机会。

克林顿的继任布什总统也是一个认错悔改的人。按美国人的话,布什也是一个“Comeback Kid”(悔改的孩子)。在40岁前,布什几乎没有多少成就,并且,还曾是个酗酒的人。布什在40岁生日时决定改邪归正,从此戒了酒,并走入政坛,当选德克萨斯州的州长开始,继而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在2000年共和党初选总统候选人时,布什当众宣布,重新找回的宗教信仰帮助改变了他的生命。如果美国人不能宽恕布什的过去,他也当不了总统,更不能连任。

美国人是宽恕的,但宽恕的前提是犯错的人要认错悔改,吉布森、克林顿、布什都犯过错误,他们都有认错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美国人的宽恕之心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



他们都有认错的态度和行为,因此,美国人的宽恕之心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